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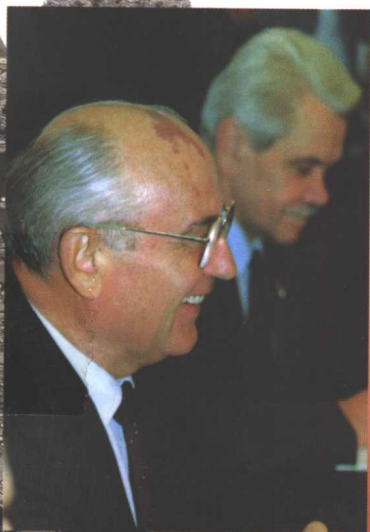
丛书

我经历的 20 世纪

在戈尔巴乔夫 身边六年

俄 阿·切尔尼亚耶夫 著

中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D75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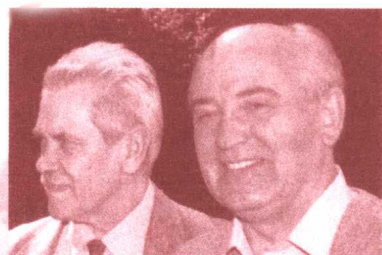
Q361

丛
书
我经历的 20 世纪

俄 阿·切尔尼亚耶夫 著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中 徐 葵 张达楠 邹用九
王 器 宣 森 黄曰韶
林 野 宋锦海 徐志文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А.С. Черняев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Прогресс» «Культура» 1993

根据莫斯科进步—文化出版集团 1993 年俄文版译出

策 划: 王 江

责任编辑: 郑金彦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装帧设计: 麟生工作室

责任校对: 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俄)切尔尼亚耶夫著;徐
葵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1

(我经历的 20 世纪)

ISBN 7-5012-1458-1

I. 在… II. ①切…②徐… III. 政治改革—概况—苏
联 IV. D7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712 号

图字:01-1999-1070 号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Zai Geerbaqiaofu Shenbian Liunian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 <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20.25 插页:2 字数:450 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12-1458-1/K·319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的话

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同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他从1985年至1991年在苏联执政时推行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戈尔巴乔夫其人和他的改革,不论在俄罗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都成了大家研究苏联这段历史时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苏联解体后这些年来,世界各国已出版了许多有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的著作。翻开这些著作就可看到,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论,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如此之近,导致苏联解体的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还不能说已经弄得十分清楚,人们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有关人物

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论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不同意见的争论势必还会继续下去。如何进一步弄清苏联解体的原因,如何进一步剖析和探讨戈尔巴乔夫其人和他的改革,这恐怕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今后需要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

要达到尽可能客观地对苏联这段历史,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目的,首先要把有关的大量历史事实及其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弄清楚,也就是要依据大量事实材料把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本来面目搞清楚。我国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同志在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写序一开始就说:“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我想他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戈尔巴乔夫这个历史人物和他的改革的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我们翻译的这本书对读者是有较大的阅读和参考价值的。因为作者本人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六年中的亲密助理,一直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而且他这本书又是以他自己在这六年中每天所记的日记作为重要依据的。作者根据他自己的日记和掌握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文件,提供了他对苏联这段时间中发生的许多关键性事件的叙述和看法。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我想在这里先把本书作者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情况作一简短的介绍。切尔尼亚耶夫虽然过去曾长期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但由于他的工作很少同中国有直接联系,所以我国知道他的人恐怕并不多。我过去也不

认识他,只是为翻译他这本书而同他有过一面之交。那就是1999年1月我受出版社的委托在莫斯科找他签署出版合同时见到了他并同他作了一次交谈。在这次交谈中我了解到,除本书外,他在这几年中还出版了两部回忆录:一部是自传体回忆录,书名《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199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写他从幼年时的2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的一生经历;另一部书名《1991年:苏联总统助理日记》(1997年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出版),主要写1991年苏联8·19事件的前前后后和苏联的解体。翻阅了这两部书,使我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

阿·切尔尼亚耶夫1921年5月生于莫斯科。他的家庭在革命前属中产阶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革命后长期居住在20世纪初莫斯科向近郊扩展时新建的一个原来主要居住中产阶层(下层官员和教师、医生等较富裕的知识分子)的区里。他的父亲一次大战前在莫斯科经营过一个机械工场,战时是沙俄军队的一名中尉军官,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又在莫斯科开过工场。他的母亲受过旧俄古典中学的教育,有旧俄时代上层知识妇女的气派,重视对自己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孩子在幼年时就学钢琴和外语(法语和德语)。这个家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到20年代后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就变得比较困难了。那时切尔尼亚耶夫的父亲进了一家国营工厂当机械工程师,母亲也到那家工厂做工。但在30年代初清理“旧人员”时,他们都被工厂清理出来了。后来母亲到一家商店当了会计,父亲同母亲离异。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少年时经历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和集体化与工业化的开始。他念完七年制学校进入十年制学校时,苏联在教育方面为适应国家培养大批干部的需要,根据斯大

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批示,决定放弃革命后不正规的教育实验,恢复过去传统的古典中学教育制度(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旧俄的中学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当年在世界上是很优良的)。因此虽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变了,但他的教育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特别是他上的十年制学校中有不少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水平的老教师,给予了他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使他从小养成了爱好看书的习惯,在年轻时就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和欧洲古典文学、哲学、历史著作。这种环境使他成长为一个受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比较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崇尚“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他说他后来在一生中常常是从他年轻时形成的这种“内心世界”去观察和感受周围的一切的。

切尔尼亚耶夫于1938年夏在十年制学校毕业后,同年秋天就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941年6月当他在大学读完三年级的时候,苏联开始了抵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卫国战争。这年11月切尔尼亚耶夫志愿参军,被编入雪橇营。四年战争时期,他一直待在西北战场前线,参加过不少战斗,1945年四五月间参加了解放里加和塔林等波罗的海国家城市的军事行动。战后他在军队中继续待了一年。1946年他复员回莫斯科大学继续上历史系四年级,在历史系毕业后又接着当了研究生,同时在莫大历史系担任教师,教历史课达十年之久。1957年他被调到在布拉格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在鲁勉采夫的领导下工作,在那里工作到1961年。在此期间,他同编辑部里的意共、法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有很多接触和交往,扩大了自己对世界的视野和对欧洲共产党的了解。1961年他被调回国内到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当时苏共中央有两个主管党的

国际联络工作的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主管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安德罗波夫曾任该部部长。另一个就是国际部,主管同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该部长期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兼任部长。切尔尼亚耶夫从1961年起在苏共中央的这个部里一直工作了25年,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于1986年初调他去做总书记助理为止。这期间,他从该部的一名调研员晋升为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他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有很多联系和接触,1966年曾作为苏共观察员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0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在60年代他曾写过几本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书。在此期间,切尔尼亚耶夫也经常参加苏共中央的写作班子,参与苏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总书记的讲话和党代会的报告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切尔尼亚耶夫在生活中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年轻时开始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生记了25大本日记,在苏共中央工作期间天天都作详细的日记,记录了他几十年中对苏联所发生的大量事件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后来写回忆录的重要依据。二是出于他的文化气质,不喜欢“出头露面”,愿意默默无闻地做自己认为“不背于自己良心”的该做的事。知道了作者的这些情况和经历,可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在本书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思想观点。

其次我想就本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特点向读者作些简要介绍。本书基本上是按时间次序写的。全书九章中,第一章着重介绍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前几年的情况,其他各章都是讲1985年到1991年六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期间的事,基本上是顺着时间一章讲一年的事,1991年因苏联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大,所以分成两章来写。从

作者为每章起的标题中可以看出,其用意是在标出各章所涉及的各个阶段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的主要倾向和他在改革实践中碰到的主要问题,也是意在为读者指明本书的基本脉络。

从全书的内容看,它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材料翔实丰富,这是这些年俄罗斯出版的许多回忆录和其他一些有关著作所不及的。这本书看来至少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我们增加对苏联这段历史的许多了解。一是苏联这六年的改革过程,书中提供了许多细节和内情,披露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小范围中的不少谈话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许多问题的讨论情况。二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这六年中的改革思想的发展变化和他对苏联国内和世界形势的认识的演变。三是苏共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的复杂的矛盾、分歧和斗争。四是这段时期苏联社会上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五是这段时期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下的外交活动的许多细节,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外交活动的内情,书中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和撒切尔夫人、密特朗、科尔、里根、布什、舒尔茨、贝克等西方大国首脑和政要的许多谈话记录。作者在书中也根据他的日记叙述了他在各个阶段对苏联的改革和内政外交方面许多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及他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议,还分散在各章中谈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弱点和不足之处的一些观察与分析。

这本书,正如作者在前言中一开头就说的,是一本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书。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然会随时想到一个问题,应如何看待和评价戈尔巴乔夫其人和他的改革?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他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致中国读者》的序中说:“不管在戈尔巴乔夫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如何,我都没有改变对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对

他的建立在新思维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的看法。”同时作者也声明,他不希望这本书会使中国读者感到它是在为戈尔巴乔夫辩护,他只是想用事实材料来证明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以便人们能公正地、根据事情的真相来做出评论。根据作者的性格和为人的特点,我相信他这些话是真诚的。不过由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他能否完全超脱地来看待自己参与的那些事件,这一点需要由读者自己在阅读时加以判断。我们觉得作者的许多观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自然其中有不少是值得商榷的。

我还想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书中,特别是在《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也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很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如何把握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他说:“对一个国务活动家作评价,更多地不是根据动机,而是根据效果。然而,如果把动机加以歪曲,那就不可能客观地去评价效果。”这个问题无疑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不过抽象地讲统一容易,而把统一论应用于实际却并不那么容易。因此如何正确把握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并对之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这仍然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包括西方大国和苏联)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进行了冷战。但即使已经出现了冷战,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如果苏中双方不犯错误,而真正建立起成熟的、良好的苏中关系,那么世界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的确,如果从理论上进行假设和推断,中苏两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年如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能早日建立和发展真正平等互利的正常关系,能从国内外

形势发展的现实出发早日开始改革,那么后来的历史就会不同。作者惋惜说,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机会失掉了”。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在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提出某种假设应该是可以的。作者在回顾中苏关系历史时提出的这一假设是否可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基础上建立了面向 21 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不是两国又一次面临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机会?如果是的话,两国又应该如何为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去把握住和利用好这次机会?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在本书翻译工作中的分工。本书的《致中国读者》、前言和第一章的译者为徐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章为邹用九(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第三章为宋锦海(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她还帮助译了第一章的一部分),第四章为徐志文(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五章为黄曰炤(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审),第六章为王器(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审),第七章为林野(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第八章为宣森(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审),第九章为张达楠(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审)。全书译文由徐葵和张达楠负责通校。本书译文难免有错误、不准确和不规范的地方,我们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徐 葵

2000 年 3 月 12 日

致中国读者

我为得到在中国出版我这本书的荣誉而高兴。这个具有伟大历史、伟大文化和伟大人民的国家，犹如把一颗极小极小的沙粒，即我这本关于我的国家的一小段历史的小书，也吸收到自己宏大无垠的知识库中去了。

我十分感谢徐葵教授，他着手把这本书提供给了中国读者。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读到它的读者在某些方面可对中国的伟大北方邻国在悲剧性的 20 世纪的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

在俄文版的序言中，我曾说明由于什么原因和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在六年时间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尔后作为苏联总统助理，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写出来，我认为那是我道义上的责任。（也是自

已过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义务)

本书的俄文版在五年前问世，本书也已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出版。在此之前和之后，作为一个个人和国务活动家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整个改革事业，已在几十本书中和几百篇文章中加以描绘叙述。其中有些具有严肃的研究性质，是客观和富有材料意义的。但这些主要是外国出版的。而在我们俄罗斯，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退出克里姆林宫以后，他和改革，不论从右的方面，还是从左的方面，都遭到了恶毒的攻击。对他的思想和意图附加了种种荒诞的臆测。大量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生活和活动的最庸俗的、同真实情况毫无共同之处的无稽之谈。

这里当然是反映了还在革命前就已形成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时期得到了加强的一个不良传统，即不想去认真地了解自己的真实的过去，特别是热衷于对前人所做的事情加以践踏和抹黑。但是，总的说，导致对戈尔巴乔夫和改革采取不公正的和非理性的消极态度的原因是俄罗斯社会目前的状况——它的灾难性的经济和道德危机，过去的理想已经消失而又没有新的理想，使国家和民族得以形成和凝聚的价值观遭到诋毁，思想的混乱和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惊慌失措。政权机构的放肆与虚伪，它们对人民的不尊重和对人民的疾苦的漠视，主要大众媒体机关的恬不知耻，驱使社会和个人都不讲道德，使不讲道德变成了生存与求生的准则。

但是，不管在戈尔巴乔夫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如何，我都没有改变对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对他的建立在新思维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的看法。

我丝毫没有放弃五年前在这本书中所写的一切。我希望，这本书不会使中国读者感到，它是在为戈尔巴乔夫作辩解，更

不是在试图证明，如果戈尔巴乔夫更多地接受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的话，那么结果就会好些。不！我只是想证实，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包括我的怀疑、不同意见和痛心），以便人们能公正地，根据事情的真相，并结合当时的具体形势去评论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动机，而不是根据后来那些不知情的或者不学无术的批评者、兴风作浪的不怀好意者以及他的公开反对者所硬加给他的东西。

当然，对一个国务活动家作评价，更多地不是根据动机，而是根据效果。然而，如果把动机加以歪曲，那就不可能客观地去评价效果。更不用说，有些人企图把目前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都说成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结果，这是最大的不公正和简直是具有个人打算的造谣蒙骗。

戈尔巴乔夫是在时代的急流中活动的。我现在认为，这股“急流”无情地把俄罗斯冲到了它在20世纪末所处的地方。我所指的是什么呢？

古俄罗斯国家莫斯科公国在历史上被伊凡雷帝时代搞得精疲力竭。17世纪初期的混乱时期，使国家陷于巨大的动荡，这个时期的剧烈变化清楚地说明了国家精力的耗尽。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人们企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这个国家，但都未能做到。

彼得大帝找到了出路：他奠定了俄罗斯帝国的开端。俄罗斯帝国对全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化。

但是到19世纪末，作为一种制度的帝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资源。它已不能承受第一次世界性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遭到了崩溃。

取代沙俄帝国的苏维埃制度对文明的主要贡献，是使一个

横跨8个时区的、具有3亿人口的文盲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爱读书和最有教育（就涉及的居民人数而言）的国家。

可是苏维埃制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资源，它是战争中的胜利者，但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蓬勃生命力具有灾难性的损失。

还在斯大林在世时，这个制度的有机的危机就已开始感觉到了。

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对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个词用来表达这个问题并不合适，但我找不到别的词），排除了使我们在苏联止住制度危机并顺利地使社会转型为某种崭新的、能够保证它在新条件下进步的社会的可能性。我用错误这个词所指的就是发动了冷战。

然而，我想在这里停顿下来作一番假想。尽管已经展开了冷战，制度的转型也许还有可能实现。伟大的中国革命胜利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由历史本身以及地理条件提供给我们的把两个伟大国家的潜力结合起来的机会。要知道，不管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本身是何等宏伟和不寻常，在50年代朝这个方向已做了一些事情。在国家的层面上，而特别重要的是在人民的层面上联结起了富有成果的与真正平等的友谊纽带。而假如我们能使这一友谊在一切必要的方面得以成熟和巩固起来，假如把两股巨大的潜力结合起来的非凡之事得以实现，那么，开始决定整个世界发展逻辑的冷战本身或许会在两大巨人的“拥抱”中窒息而自毙。须知，正如后来弄清楚的，美国和北约对苏联和中国的现实核威胁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其他什么进攻了。各种挑衅、关于西方参谋总部各种计划的情报的故意泄露、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它主要是由众

多大公司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刺激起来的)，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从结果来看，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而最英明和正确的应该是藐视所有这些威胁，大体上要像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对之做出反应，即通过蔑视和讥嘲的照会把美国飞机对本国领空的无数次侵犯记录下来。一句话，应对美国人的种种无理要求和挑衅采取符合两个伟大国家的尊严的藐视态度，不予重视，而始终去干“自己的事”，包括推进两国人民的创造才能的协调配合，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自己和整个国际社会。

不言而喻，为了使在世界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中—苏—俄罗斯因素成熟和巩固起来，必须改变那些把意识形态置于优先地位的东西。由十月革命开创的那些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不起作用”，已不适合于通向未来的前进运动。

然而，在莫斯科，人们在“开始新生活”（苏共 20 大等等）的尝试中只具有采取一些不彻底措施的智慧、力量和性格，而完全缺乏智力与政治资源去理解苏中因素不仅对本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潜力。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则最终扑灭了使这个因素及时成熟的可能性。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机会失掉了。冷战逻辑（其中也包括苏中关系中的冷战）占了上风，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都是如此。（只需提一下转授原子弹武器秘密问题所起的非常不幸的作用就够了）差不多持续了三个十年之久的争吵和敌对，不仅使冷战的后果在其主要战线上加重和尖锐起来，而且使两国进一步把大量的资源拿来用于违反人民利益的目的。

对我们，对苏联来说，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

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 80% 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相信，他开始改革而从事的工作，是拯救国家于崩溃，同时也是使全世界免除核灾难的最佳方案。具体看来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从“近处”观察了戈尔巴乔夫，我试图在本书中叙述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不言而喻，许多事情，不仅是改革进程和戈尔巴乔夫活动中的一些细节，而且是这些方面的一些巨大问题，不属于我叙述的范围。试图包罗一切，这是不允许的过于自信，也是十分愚蠢的。我在本书中对改革所作的叙述，是我个人对当时所发生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认识的一个缩影。我是就我所见而加以再现的。我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甚至是主观的色彩。读者即使没有我的提醒也会想到这一点。

现在我要说几句，根据我的意见，“历史的急流”将把俄罗斯冲向何处。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在他周围的人们和世界上相信他的善良意图的人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引导这股急流去为自己的人民谋福利。他想以此来纠正他的先辈们在 1945 ~ 1946 年间犯下的错误。

看来，俄罗斯国家正在经受着自己最后的历史考验。它已经为履行自己经历几个世纪之久的帝国职责而精疲力竭，它已失去了大国自我实现的冲动，它没有来得及在自己身上造就在新的基础上求得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潜力。它没有在改革中经受住严峻的考验。也未能保证同苏联过去的组成部分实现文明的分离，它们意在利用并得以实现列宁的“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的口号。